专 题

亚太秩序的变化与日本的战略

[日] 佐桥亮

内容提要： 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崛起的中国对于日本在经济方面是机会，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确实是挑战。日本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和主权与海洋运输线相关的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维护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实现这些目标，日本主要依靠三种手段：一是强调威慑的日美同盟；二是以软制衡为中心的新亚洲战略；三是将中国纳入一体化进程之内的中日关系和地区主义。同时，日本可以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媒介的作用，避免中美走上对抗的道路。

关键词： 日本外交 日美同盟 中日关系 亚太战略

一、亚太秩序变化的本质

全球化发展导致的经济机会与社会交流的增加以及国家间势力均衡的变化都促使亚太地区的战略环境发生着急剧变化。今天的世界以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深度与速度开始结合在了一起，甚至有时国境的存在都会被遗忘。以低廉劳动力成本为基础崛起的新兴国家中，作为其代表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均位于亚洲，并正在加强其军事政治实力，意欲实现常年积聚的目的。迄今为止的国际秩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欧各国的存在感与价值观之上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基调是以美国的领导地位及其提供的公共产品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但是权力重心正逐渐由欧亚大陆的西侧移向东方，并且随着政治体制与价

[日] 佐桥亮 神奈川大学法学部副教授，日本国际交流中心客座研究员，东京大学法学博士。

值观多样化的新兴国家的崛起，现有秩序的前提开始动摇。[1]

美国奥巴马政权之所以打出“太平洋国家”的口号，也是为了应对上述变化。美国一面认识到中东的现状是资源将会减少，而且仍未安定，一面强烈表明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首先是因为美国有着绝不能被排除在亚洲经济增长及社会融合过程之外的强烈意识。[2] 但同时，美国也清楚意识到，美中关系已开始具备了超出人权、台湾（地区）问题等范畴的权力转移因素。2010年后，美国出现了对中国的一种担忧，认为中国基于今后中美实力对比将发生变化的预测，将对周边国家采取高压性的行动，挑战国际秩序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谋取地区霸权，并开始对美国信奉的价值观提出异议。[3]

当然，美国经济军事优势地位的积累仍然巨大，势力均衡的变化也只是在缓慢进展之中，但秩序与领导权的变化正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却是不争事实。正因为这样，奥巴马政权才提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以军事优势为支持，试图在地区及全球秩序的形成过程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并在保持地区安定的同时推进民主与人权，而最重要的是开始明确了推动经济高度自由化的意图。“9·11”事件后，美国在双边关系及APEC中都将国际恐怖主义作为中心议题，考虑到这一背景，上述举措甚至可以让人感觉到美国的某种焦躁感。

但是，如极端而言，美国再次将亚洲列为重点的宣言只是受到亚太地区急剧变化影响的一个插曲。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大大加强，这一进程中，日本、中国、韩国、东南亚各国，以及美国、欧洲都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形成了对各方来说都不可或缺的紧密关系。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陷入困境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从今天各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多极化的欧洲出于均势目的的合纵连横，还是冷战期间建立的政治、经济都对外封闭的两个阵营之间的竞争性秩序，都是不会受到欢迎的。[4] 即使某些国家因领土争端加深对立，其他国家也会避免被卷入其中，甚至希望获取渔翁之利。此外，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主要大国都奉行市场经济，依赖市场。很难想象，意识形态对立或意见对立可以束缚国家的行动，割裂世界，并阻碍经济、社会层面上的一体化。

很难想象，意识形态对立或意见对立可以束缚国家的行动，割裂世界，并阻碍经济、社会层面上的一体化。

1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Evan Feigenbaum, “Why America No Longer Gets Asia,”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11, pp.25-43.

3 有关美国国内对华认识的变化参见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

4 这一点亦可参照基辛格的以下论述：Henry A.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Apr 2012, pp.44-55。

总之，现实世界中，这一地区不断成长着的战略环境，足以使尝试从历史教材中寻求类似案例的努力成为徒劳之举。奥巴马政权的太平洋国家口号、中国的战略都受到现代特有的条件的限制。而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在政治领域也保持相当存在感的日本，其外交在权力转移的格局变动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与中国相互依存这一新的战略环境的制约。

本文将分析仍苦于缺乏政治领导力的日本正在摸索的战略。这并非如鸠山政权提倡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一样对中国进行单方面战略缓靖的政策，而是将日美同盟作为手段全面加以利用的战略。但同时，为了实现日本的安全与繁荣，中国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这就要求日本不能仅停留在对话与合作的阶段，而应尝试实现亚洲真正的一体化。美国回归亚太地区是值得欢迎的，但要将其导向基于新均势的秩序形成，日本及本地区其他国家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据此，本文将在讨论对日本而言中国的存在意义、何为日本的大战略后，进一步论述日美同盟、亚洲战略与中日关系。

二、中国对日本的双重性

崛起的中国对于日本而言是何种存在？我们可以以两幅地图作为思考的线索。无论哪幅地图都是日本最近使用的。前者登载在拥有读者数量最多的报纸上，后者则是在政府的报告书之中。但是，对这两幅地图背景中的中国的印象却大相径庭。这里并不是说哪一幅地图是正确的，而是说根据不同需要，在日本人眼里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幅地图都是将我们一般看到的东北亚地区逆时针旋转90度，以东为上，即东海与日本在中国大陆之上。

第一幅地图以福冈为圆心勾画了两道同心圆。大阪、首尔同在500公里的同心圆附近，而1000公里同心圆附近则有东京、上海、青岛和大连，地图的标题是“与亚洲距离相近的九州”。报道称九州地区的行政、产业正在携手合作，试图利用亚洲的经济活力摆脱依赖东京的经济局面。如果看到这幅地图，甚至会感到与持续稳定成长的韩国，特别是世界经济发展发动机的中国毗邻相接是充满希望的。[1]

1972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在2010年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次贷危机后仍持续增长的中国在名义GDP上超过了日本，至少在国家全体经济规模上，从日本手里抢走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称号。即使经济增长会有所缓慢，中国2020年后半期也可能超过美国。日本现在约20%的贸

日本现在约20%的贸易依赖中国，但据预测到2030年将超过40%。

1《読売新聞》，2012年2月20日。

易依赖中国，但据预测到2030年将超过40%。[1]

被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所吞没的不安感在日本也有所增加。比如，有些公司担心是否会被中国企业收购。就在最近，大型电器企业把过去显赫一时的家电部门出售给了中国企业。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符合日本的利益，这种淡淡的期待在日本很有市场。不仅仅是作为生产者，作为市场如果不通过游客和留学生充分利用亚洲的活力，日本就会被时代淘汰，这种充满焦虑感的议论也在增加。

第二幅地图则是日本的安全问题专家都熟悉的。该图从日本列岛经由冲绳直至菲律宾画出“第一岛链”线，并用明显的线条标出了中国舰队从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峡通过、在冲之鸟岛（冲之鸟礁——译者）附近公海进行演习的路线。的确，看到这幅地图后，就会注意到在中国大陆进出外洋方向上横亘着包括西南诸岛在内的日本列岛。[2] 如果单纯地按照国防支出的增长率进行计算，中国在本世纪30年代前半期就有可能赶上美国，那时中国的国防支出将可能是日本的10倍以上。[3] 在以这种速度增长的军力面前，这幅地图上的日本看上去处于无法防备的状态。

2010年9月，中国渔船在尖阁群岛（钓鱼岛——译者）附近非法捕捞并撞击巡视船只，遭到了海上保安厅的抓捕。本文不涉及两国对这一领土问题的主张，但日本认为中国政府的反制措施过于强硬却是事实。在南海问题上，人们也认为中国的行动开始强硬，并因此推断中国借助日益强大的经济与军事能力，开始放弃长期坚持被称为韬光养晦的低调姿态，以高压态势对待邻国。这也导致了当年秋天日本政府实施的舆论调查中，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急速下降。[4]

三、日本的大战略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在经济上是机遇，在军事、政治方面则是需要保持一定戒心和警惕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可能变得迟缓，但很多研究认为，经济的迅速崩溃等论调并不适合战略性讨论的范畴。此外尽管也存在着因政治制度不同而把中国作为“异质”性存在、视中国为威胁的观点，但如果决策错误，日本将有可能在中国与亚洲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处于落后地位，这种观点也较有

1 森聪、佐桥亮、伊藤庄一、小谷哲男、矢崎敬人：《ルール推進国家　日本の国家安全保障戦略》（《推进规则的国家——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笹川平和财团，2011年。

2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编：《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2011》（《中国安全报告2011》），2012年。

3 神保谦、佐桥亮、高桥杉雄、阪田恭代、汤泽武、增田雅之：《日本の対中戦略》（《日本的对华战略》），東京财团，2011年。“The Dragon's New Teeth: a Rare Look Inside the World's Biggest Military Expansion,” *The Economist*, April 7th, 2012。

4 2011年10月的调查显示这一情况得到了相当的改观。内阁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外交舆论调查》），2012年1月。

影响。那么，日本应制定什么样的大战略呢?

在追求安全与繁荣的日本外交战略目标中，首先是要确保主权及与主权有关的利益，并保护与日本周边及海上运输线有关的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其次，在步入世界上都史无前例的少子高龄化社会后，在人口减少的压力下实现经济增长；最后，维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促进了世界发展的国际秩序。从这个意义上，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亚洲在社会经济上进行一体化就非常重要。尽管对华政策正是其核心内容，由于需要同时满足这三个目标，所以仅仅依靠管理对华政策是无法实现的。另外，不言而喻，与中美相比实力处于相对劣势的日本仅依靠一己之力是无法实现这些目标的。

尽管对华政策正是其核心内容，由于需要同时满足这三个目标，所以仅仅依靠管理对华政策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日本最为合理的战略就是结合三个手段。尽管因国内政治领导力的混乱和迷失，战略仍不清晰且尚存不足，但仍可认为现在的日本外交大体上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这三个手段就是旨在威慑与应对的日美同盟、具有软制衡（soft balancing）性质的新亚洲战略以及将中国纳入一体化进程之内的中日关系和地区主义。[1]

（一）日美同盟

三个手段中，最传统的手段当属日美同盟的威慑与应对。正如在奥巴马政权担任了三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杰弗里·贝德在其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所言，日美两国政策圈内均认为日美同盟的“中心性”是理所当然的。[2]

从日本的角度看，为了控制防务支出以优先发展经济，确立民主政治以切实走上和平国家道路，才确立了日美同盟关系。此外，对避免重犯发动日美战争这样最大的战略错误并回归国际社会而言，日美同盟也一直是最有效的手段。冷战结束后，这些同盟存续的主要动机都没有受到削弱。很多人会将被称为不战共同体或已成为命运共同体的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视为日本最大的战略资产，此外，1994年朝鲜核危机后，日美同盟正是应对地区不确定性的关键的认识也进一步加强。因此，可以认为，日美同盟并不是冷战的“残渣”，也不是路径依赖的产物，而是基于国家理性计算的、经过修正和选择的结果。

日美同盟并不是冷战的“残渣”，也不是路径依赖的产物，而是基于国家理性计算的、经过修正和选择的结果。

如同第一次朝核危机、“9·11”事件促成了政府层面对日美同盟的修正一样，现在中国的崛起以及日美两国的政治变化也进入了两国政府的视野，换言之，冷战结束后第三次对同盟的修正进程已经开始。正如2012年4月美日两国首脑会谈所提及的，如

1 神保谦、佐桥亮、高桥杉雄、阪田恭代、汤泽武、增田雅之，前引书。

2 Jeffrey A. Bader, *op. cit.*

日本为美国将其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网络化所作的贡献将比对美国全球合作的贡献更为重要。

何应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包括宇宙空间、网络空间在内的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规则制定等正逐渐成为日美同盟的主要议题。由此，日本为美国将其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网络化所作的贡献将比对美国全球合作的贡献更为重要。[1] 由于亚太地区的稳定比与全球恐怖主义作斗争更直接地关系到日本的安全，因此，美国国防战略中对亚洲的“再重点化”及给予亚洲优先顺位的举措，对于在军事方面日益担忧的日本而言可谓福音。

日美同盟与本地区存在的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同盟之间的网络化正在发展，这是重要的变化。美澳两国在2011年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的磋商中加入了在网络安全上进行合作、反对在南海使用武力的内容，11月奥巴马总统与吉拉德总理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明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将派驻澳大利亚的立场。2010年后美韩也因为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而产生了加强同盟的动力。在这一时期，为了克服以往的“轴辐关系”（以美国为轴心，以美国为一方的双边同盟为“车辐”的美国亚洲同盟体系——译者），日美澳、日美韩之间的三边关系随着日韩关系的强化而开始成为可考虑的目标。特别是过去5年间日澳关系的发展值得特书一笔。日澳关系的发展明确反映了两国的意图，即明确在应对多样化的安全问题中进一步承担责任，并支持美国对亚太地区的介入。在日印关系中，2012年4月日印外长会谈也就进一步开展海上安全合作达成了共识，并决定两国从今年起开始双边海上训练，并早期建立外交、防务次官级对话制度。此外，从2011年12月起日印两国的局长级磋商已实施了2回，在更紧密地联接西太平洋与印度洋这一思路的驱动下，对海洋的深度关注将各国联系在了一起。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中，日本决定将军事能力用于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等危机状况。菅直人首相决定动员10万名自卫队员，并将东京电力公司的职工留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做出了正确的政治判断，这值得人们铭记。此外日美两国发动“朋友行动”（Operation Tomadachi），动员美军参加救援活动。“朋友行动”改善了同盟的政治印象，向周边国家宣示了日美同盟的牢固性，在战略沟通上意义重大。此外，海外军事行动频繁的美军所拥有的部署能力和高昂的士气也让自卫队大开眼界。东日本大地震使只有发展中国家才会动用军队参与

1 日美两国政府2011年6月扩展了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其中很多可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此外，日美同盟在同盟运用层面中，情报收集、警戒监视、侦查活动（ISR）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在2012年4月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的联合公报中也可看出这一点。Ryo Sahashi, “New Common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 Continuing Quiet Transformation” *Asia Pacific Bulletin*, Honolulu and Washington DC: East West Center, No. 125, July 25, 2011。《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联合公报》），2012年4月27日。2012年4月野田总理访美时的共同声明参见《日米共同声明：未来に向けた共通のビジョン》（《日美共同声明：面向未来的共同愿景》）、《ファクトシート：日米協力イニシアティブ》（《介绍：日美合作方案》）。

自然灾害的救助活动这一不成文的认识土崩瓦解。亚洲是世界自然灾害集中的地区，今后，军队在救灾中的作用会得到积极肯定，为此多边演习也可望实现常态化。[1]

日本2010年制定的新防卫大纲中采用了机动防卫力的概念，其目的在于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2] 今后仍有必要通过与唯一的盟国美国之间的合作与责任分担进行威慑与应对，同时，也会在建设防卫力时考虑凭借自身力量应对可能出现的局面。

（二）作为亚洲一员的日本的新基轴

日美同盟仍然是日本的重要手段，这一点毋容置疑。但日本的亚洲战略却没有止步于强化日美同盟，而是出现了新的进展。为了在权力转移的时代也维持基于规则的亚太秩序，日本正在致力于不使本地区出现崛起的新兴国家以其存在感压制其他中小国家的局面，这也可以被归入到软均势的范畴之中。

相互依存时代的国家有必要在与所有大国的交往中确保自身的利益，同时也要维持中小国家也可保持自律、基于尊重国际法、双边及多边外交谈判规则之上的秩序。在这种状况下，应避免对崛起国家进行均势或迎合的行为，同时为了拒绝受到支配，中小国家也要采取包括全面制度建设、经济外交、保持中立等在内的各种非军事手段，以尝试阻止大国行使权力。这种情况可能会不断增加。[3] 日本正与中小国家一同开始对崛起的中国采取可解释为软制衡的行动，为此也在尝试将美国的实力用于这一目的。

日本正与中小国家一同开始对崛起的中国采取可解释为软制衡的行动，为此也在尝试将美国的实力用于这一目的。

这方面典型的案例就是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ADMM+）以及美俄参加东亚首脑峰会。这些以东盟为基础的地区制度安排是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协商体，但却容许地区外的美俄两国参加，其背景除了东盟对澳大利亚的亚太共同体构想产生的一定焦躁情绪并试图夺回地区一体化的主导权外，也可以明显感到东盟以下的意图，即为了应对南海领土争端中日益紧张的局势，面对影响力增强的中国，在多边机制中适当利用美国

---

1 日美两国政府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最初的应对阶段因相互沟通混乱，缺乏在平时对核事故应对政策上的调整而增加了相互不信，但很快关系就得到了恢复。日本再建倡议会（日本再建イニシアティブ）：《福島原発事故独立検証委員会　調査・検証報告書》（《福岛核电站事故独立验证委员会　调查验证报告书》），2012年3月11日。

2《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关于2011年度后的防卫计划大纲》），2010年12月17日。

3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1, Summer 2005, pp.7-45;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4. No.3, September 2008, pp.489-518.

以期待软制衡发挥作用。日本欢迎这一动向，奥巴马政权也趁势而入。在亚太地区，美国如此认可多边主义，并大力加以利用实属罕见，其背后的动机就是要维持不仅仅是东盟各国，更是整个亚洲地区的均势。[1]

不基于同盟的亚太地区安全合作也在取得进展，这也可以认为是针对中国影响力所采取的软制衡的一环。中小国家为了在领海警戒、防空、反恐反海盗对策、救灾对策等非传统安全中强化能力，都在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大国和中等强国加强关系。美国与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盟各国之间加强了政府高层及事务级别的交流，增加了发表联合声明、舰艇访问、参加阅兵式、人道主义任务、有关设施装备的训练、提供技术等在内的各种活动。日本也通过双边、多边机制加强东南亚各国的海上安保能力，并将更灵活地运用政府开发援助计划。2011年末日本缓和了武器出口三原则，使得防务装备可以出于和平贡献与国际合作的目的向海外移转，2012年将向菲律宾提供大型巡逻舰。而日美两国政府也就战略性运用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以促进亚太各国所希望的安全局势这一思路达成了共识。[2] 可以说，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中也逐渐显现了政治及影响力博弈的因素。今后，在有关规则制定等多边磋商中，日本也会与东盟各国在各个议题上促进松散联盟的建立。

同时，在围绕制定自由贸易规则的过程中，制衡中国的观点也已出现。尽管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正在不断发展，但由于担心中国存在感过大的经济合作反而可能阻碍地区的市场开放，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开始尝试利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应该说，将这一动向定性为遏制中国的说法可谓冷战思维的遗产。相反，没有任何议论认为TPP是制度与标准制定的主导权之争，并会损害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开放性。日本正处于为推进国内改革以防止被亚太地区的增长甩在身后而参加TPP谈判的摸索阶段，但却已表明立场，无意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中排除中国，[3] 并将早日开始以中日韩与东盟为中心的经济合作机

1 Jefferey A. Bader, *op. cit.*, p.8，美国担忧亚洲形成将美国排斥在外的地区机制，使得美国的政治影响力被弱化并丢失经济机会。亚洲货币危机中美国对亚洲货币基金构想的反对，最初对鸠山由纪夫政权"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强烈批判无一不出自这种警惕。为此，美国也产生了在加强双边关系的基础上，参加地区性机制的动机。美国正在推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定期化，多边制度只是手段之一。很多批评认为该对话正陷入功能不全的境地，美国新参加的多边磋商能否成功也是未知数。包括中美两国的机制只能发挥掩饰中美两国分歧的作用，还是可以为地区稳定作出贡献，尽管这只能由未来发展来判断，但如果地区机制不能在解决担忧问题上取得足够的成果，那么地区主义的信赖性就会丧失，地区各国就可能被迫采取新的行动。

2《日本经济新闻》，2012年3月22日。《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联合公报》），2012年4月27日。

3 田中均：《経済教室　TPP参加と日本の未来　東アジアの安定に不可欠》（《经济教室：参加TPP与日本的未来 对东亚的安定来说不可或缺》），《日本经济新闻》，2011年12月14日。

制的谈判。[1]

（三）协调的中日关系所发挥的作用

在卡特政权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认为，为了实现亚洲的稳定，对中美日三边关系进行管理十分重要，其中中美关系在克服障碍的同时，中日还应建立协调的关系以在秩序转型期继续向日本提供安心感。[2]

最近的国际时局议论中，有些评论认为日本在亚太秩序中的重要性下降了。首先，日本苦于被称为“失去的20年”的经济低迷，同时，由于在世界上率先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其将来也比较暗淡。其次，由于缺乏领导力，缺失了政治重心，日本外交也丧失了存在感。但是，布热津斯基及布鲁金斯学会的理查德·布什均认为，中日关系如能实现协调发展，将会对中美关系以及这一地区稳定推进一体化的前景带来重大影响。[3]

日本应构建什么样的日中关系？正如本文所指出的，应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对具有不确定性的中国军事增长采取威慑与应对，同时利用制度与伙伴关系对日益增长的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采取软制衡。在此之上，日本应构建新的中日关系以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亚太地区，并形成双赢关系。

2009年9月，在实现了历史性的政权更迭后成立的鸠山由纪夫政权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与对华政策受到了日本国内和美国的强烈批评，外交政策上的失势断送了鸠山首相的政治生命。将日本定位成一个在中美两国夹缝中的国家这种自我认识其本身并非一定就是错误，但不可否认，这一言论低估了日本对美关系所具备的战略意义以及美国对其亚太地区利益的敏感程度。日本历届政府均反复主张亚太政策中的开放性即意味着接受美国介入。不利用美国的权力追求与中国的战略妥协，这种鸠山首相风格的共同体构想不会再次复活。

继任的菅直人首相、野田佳彦首相在修复日美关系的同时，逐渐开始构建立足于应对中国崛起的日中关系，其意图在于强化日美关系以作为预防手段，在牵制中国的亚洲战略中发展与中国的关系。2011年12月中日首脑会谈中双方达成共识的两国海洋安全高级别定期磋商将于2012年5月举行。考虑到中日两国面临的困难很多都是以海洋为舞台的，这一进展意义重大。此外，为了应对货币危机，中日也都认识到在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基础、扩大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的融资额度等问题上双方并非竞争关系，而是在应对危机

1《第180回国会における野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第180回国会野田内阁总理大臣施政方针演说》)，2012年1月24日。

2 Zbigniew Brzezinski,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2, pp.97-104.

3 Richard Bush, *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中有重大的共同利益，认为应继续保持密切磋商。此外，现在日本政府正在提议举行日美中对话，这一建议能否有助于发展三国共同的战略视野，值得期待。[1]

今后中日之间能否构建可信赖的战略互惠关系，可起到试金石作用的一个领域就是朝鲜问题，朝鲜领导人交接后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交涉的机会，但2012年4月的导弹发射却加深了人们对朝鲜政治不透明性的疑虑。日中两国有必要与韩国、美国一同继续进行国际努力，敦促朝鲜放弃核计划。如果可以期待今后局面出现好转，中日两国就有必要对朝鲜半岛的中长期远景、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建立以及各国对此的必要支持等问题进行对话磋商。

在对中日两国关系的管理中，对两国国民感情的顾虑日益重要。

在对中日两国关系的管理中，对两国国民感情的顾虑日益重要。很明显，多元化的媒体缩小了两国政治家、决策者可能采取政策的幅度。为了构筑健全的两国关系，政治家、官僚、媒体、意见领袖的交流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作为日本，与棘手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是邻国的中国打交道，有必要培养具有战略意识的人才，并构建人才网络。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世界里，个人、企业活动、社会之间的强力结合将发挥以前从未有过的波及效果。如果回顾互为敌人进行过太平洋战争的日美关系在战后通过官民一体的交流而发展成为根本无法想象的紧密关系这一历史，设想通过非国家行为体结成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也非盲目乐观。[2]

四、作为媒介的日本

在与布热津斯基的主张所不同的意义上，日本在中美日关系中有着自己的作用，换言之，可以缓和中美间的竞争关系。美国暗含着与日本不同的严厉的目光。尽管美国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不认同、少数民族问题、人权问题等美国式的过滤镜都在不断制造着对华负面印象。以往，美国在选举期之外都将反映价值观差异的问题搁置一边。但是，在本国的权力优势这一前提将要崩塌的疑念之中，崛起的中国将在价值观上挑战美国并试图动摇美国的领导地位的印象将可能把美国推向建立竞争性的秩序。[3]

正因为如此，作为日本的另一种战略，必须去考虑中国融入世界的路径。今天，没有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参与的国际协议正逐渐变得没有意义，这种状况

1《第180回国会における玄葉外務大臣の外交演説》(《第180回国会玄叶外务大臣的外交演说》),2012年1月24日。

2 有关日美关系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参照入江昭的议论。入江昭:《現代世界史としての日米関係》(《作为现代世界史的日美关系》),《中央公論》，2011年10月号。

3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Pri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1.

今后还会更为明显。为了敦促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不应只要求中国承担与其经济大国身份相应的责任，也有必要接受其在国际组织及全球治理中相应的发言权。而这正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所经历过的。中国日益认识到其在全球化过程中充分享受着生产与投资以及支持这些活动的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好处，并因此国力持续增长，从而在以规则与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是日本与国际社会应该欢迎的。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是支援中国的以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国际派。

为了敦促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不应只要求中国承担与其经济大国身份相应的责任，也有必要接受其在国际组织及全球治理中相应的发言权。

必须避免美国因恐惧采取对华强硬政策，并由此走上建立对抗性的秩序。[1] 在这一点上，日本及澳大利亚、印度等中等强国作为媒介（catalyst）的作用就十分重要。作为美国重要的安全伙伴，这些国家可以帮助中美两国建立彼此间正面的互信关系以及更加紧密沟通的制度，还可以提出设想促使愈发强大的中国以软着陆的方式接近国际秩序。美国应可满足于以维持自身领导地位的形式推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正因为如此，在中美关系框架中可能难以承受的美国持续施压的状况下，中国应也可以接受第三方的存在，以得到对中美关系进行再调整的战略机会与战略缓冲。[2]

结语：秩序转型期中日本逐渐成型的战略思维

日本应追求均衡的对华战略。只将中国作为威胁、因政治体制的不同而疏远中国的理论已无意义。另外，只将中国作为日本经济增长之动力的理论也不充分。日本外交不应陷入与中国合作或对抗的二元对立论，一方面应强化同盟网络以支持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参与，并开展不以同盟为条件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在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多边机制建设的同时发展中日关系。日本应在发挥美国同盟国的作用的基础上，实现在两个超级大国与中小国家间发挥桥梁作用的自我定位，通过上述综合性战略的实施，参与地区秩序、维护本国的和平与繁荣。中日美关系的加强也应按照这一战略思路

日本应在发挥美国同盟国的作用的基础上，实现在两个超级大国与中小国家间发挥桥梁作用的自我定位，通过上述综合性战略的实施，参与地区秩序、维护本国的和平与繁荣。

1 田中明彦认为，在目前美国的军事优势尚不可能瓦解的前提下，值得担忧的就是“中国国内对本国实力的过高评价，以及支配性大国美国的僵硬应对”。田中明彦：《パワー・トランジッションと国際政治の変容：中国台頭の影響》（《权力移转与国际政治的变化：中国崛起的影响》），《国際問題》，第604号，2011年9月，第5—14页。

2 澳大利亚对此问题的看法亦可参照Hugh White, “Power Shift: Australia’s Fu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Quarterly Essay*, issue 39, 2010,pp.1-74。

予以推进，这也可能成为由竞争性秩序构建转向共同体秩序构成的重要步骤。

野田首相强烈希望出台亚太政策作为其外交方针。在日本国内，税制与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改革引起了可能会决定政权命运的争论，日本对外仍坚持着高层次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包括中俄两国在内的秩序构建、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1] 在政治基础并不稳定的状况下，日本能否连续性地推行本文所论及的战略尚有疑问，但这一方向却正在日益明确。

最后，本文将以列举可能会发生迫使日本不得不进行战略修正的战略性冲击（shock）作为结束语。首先最大的冲击就是美国以超出预想的水准急速削减国防预算。其次，阿富汗局势急速恶化或发生大规模恐怖事件时，美国的战略关注会再次移向“反恐战争”，从而改变战略方向。再次，俄罗斯在欧洲、中亚一线急速扩张，强化与北约的对抗姿态，这将从根本上扭转现有的战略方向，对中美日三国意义重大。最后，中印关系走向冲突，导致紧张局势的突然升温。正因为其不可预测性，战略性冲击必须成为日本战略思维所考虑的因素。但本文仍以这些战略性冲击并不存在为前提论述全球化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日本战略。

（刘星　译；归泳涛　校）

1 有关现政权的亚太政策，菅直人政权时期担任外相的前原诚司2011年1月在华盛顿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进行的演讲十分重要，并可被认为是鸠山政权后的基本方针。“アジア太平洋に新しい地平線を拓く”（“开拓亚太地区新的地平线”），2011年1月6日。